



从利玛窦看中西文化交流

◆ 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王 齐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10年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逝世400周年。利玛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到达澳门,后至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最终于1601年来到北京定居,直到逝世为止。利玛窦来华的意义既不同于张骞为联络西域诸国抗击匈奴而西行,也不像马可·波罗作为旅行家和探险家来到中国,他是被耶稣会派到中国传播天主教义的,也就是传播一种新思想、新文化,而实际的效果却是利玛窦成为向明代社会输送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文化使者。围绕着利玛窦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第一”。他在广东肇庆修建了中国的第一座欧式建筑,而这座建筑又成为第一座展示欧洲图书的图书馆,他绘制了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Typvs Orbis Terrarvm; Map of the Myriad Countries of the World),1602年首版后多次重印并广为流传,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仅存6幅;他与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以及最早的中国籍耶稣会士钟鸣仁(1562~1622)合作,第一次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完成了一部按字母排序的葡萄牙语与汉语对应、有时加有意大利语的《葡汉辞典》,这很可能是中国第一部欧汉辞典;利玛窦去世后,首批加入耶稣会的中国信徒游文辉为他绘制了画像,该画像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幅油画,目前仍悬挂在罗马杰苏(Gesù)教区的耶稣会士住所,而利玛窦本人亦成为第一个由皇帝下诏赐地葬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不管是否符合其初衷,利玛窦以其行动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个为人确知的文化使者,第一次开启了中西文明在多层面上的对话和交流。

中国人对西方宗教以及传教士曾经心存戒备。在西方殖民扩张的时代,宗教作为文化殖民的一个层面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利玛窦与印象中的传教士形象大相径庭,他更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凭借其超凡的语言天分、渊博的学识和谦和的人格,以文会友,著书立说,在明代上层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中游刃有余。而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识以及在制作地图、地球仪、天体仪、日晷和机械钟表等方面的才干,又使他超出了一般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除去先天素质不论,利玛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成就,这与天主教耶稣会于1534年成立之初所定立的方针和目标有直接的关系。耶稣会的成立原本是针对以路德、加尔文、茨温利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当时宗教改革者指责天主教士愚蠢无知、贪得无厌,而耶稣会立志改变这种状况,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教育计划,既注重神学造诣的培养,又不忘古典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学习,尤其注重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的传授,西塞罗、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成为耶稣会所信奉的学术权威。除利玛窦外,其他来华的耶稣会士例如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都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都留有多部中文著作。事实上,16、17世纪的耶稣会士早已不单是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了,在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眼中,他们已经是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培养起来的才华横溢的学者和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专家。因此,当利玛窦终于艰难地完成了进入中国传教的“通往月球”的旅程的时候,他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数学、天文

学的兴趣远胜过了对于天主教义的兴趣,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传教方法,逐渐形成了“智性传教”的策略,积极在中国推广和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他成小时地为地方官员上数学课,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及部分萨罗斯克的《天球论》(Sphaera);与李之藻合译了利玛窦论述天体立体投影的著作《浑盖通宪图说》,二人还合作将其恩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术概要》(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编译为《同文算指》。在发现明代中国仍在沿袭着从元朝流传下来的源于阿拉伯的有诸多错误的天文学知识之后,利玛窦开始热心地介绍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的“地心说”。但是,哥白尼早在1543年就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提出了直接挑战托勒密体系的“日心说”;1592年布鲁诺因为宣传“日心说”和其“宇宙无限”的观点遭宗教裁判所逮捕,1600年在罗马被处以火刑,但不知何故利玛窦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新学说。后来,哥白尼的著作于1616年遭到教会禁止,当汤若望进入钦天监主持中国历法变革的时候便迫于教会压力仍然恪守“地心说”,暴露了耶稣会士作为16、17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探索者的致命弱点,即在宗教信仰与科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科学。

利玛窦在中国积极传播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的行动并不为天主教会所完全理解。无论是其生时还是去世后,不断有来自教会内部的批评,认为利玛窦的举动偏离了传教的目的,甚至有极端人士对利玛窦在觥筹交错之间和礼尚往来的理念之下广结关系网的做法提出了批评。1614年,耶稣会日本省区会长卡尔瓦罗禁止采用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明令神父只许讲授福音,不允许教授数学、哲学以及参加修订历书。今天看来,利玛窦从根本上并没有背离传播天主教义的主旨,他之所以选择走智性沟通和上层路线的策略,只是为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而采取的一种“手段”。通过与明朝上层学者官员的交往,利玛窦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有其独特性,要想使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必须从其思想根源入手。他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既充分利用西学的专长,又积极地研习中国文化。他将“和而不同”视为交流的原则,汲取各家之长。利玛窦扬儒贬道,激烈地批判佛教的“偶像崇拜”。他从符合天主教义的角度出发推崇孔子的伦理学说,同时他也看到孔子学说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欠缺。为此他希望为

儒家学者补上自然科学这一课,希望他们通过对“自然秩序”的认识而通达至对超自然的“神圣秩序”的认识。这个思路从根本上丝毫没有脱离基督教。在基督教思想当中,人是“有限的”理智存在者,而上帝则是“无限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有限”能否以及如何认识“无限”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类比”原则因此而生,也就是说,人们有可能通过对“有限”的认识“上升”到对“无限”的认识,通过对“自然秩序”的把握“上升”到对“超自然”的神圣秩序的把握。只是在神学家的眼中,仅靠人的有限理智尚不足以把握“无限”,人们还需要接受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为了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古代的教父们大胆地应对希腊理智主义的挑战,积极地吸取其中有利于基督教信仰的成分,提出了“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观点,希望使信仰经得住理性考量,其成果便是一系列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这些证明虽然受到了启蒙时代哲学的严厉批判,但它们所具有的内在逻辑性却是对希腊理性主义精神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翻译、推介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因为该书是克拉维乌斯所译注,而是因为利玛窦相信,欧氏几何体现出的严格的逻辑证明精神对于中国人接受天主教信仰将会有所裨益。

除了围绕天主教义而展开的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交锋外,利玛窦还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文化现象,他品评中国的绘画、音乐,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诗歌、书法,开展文化的双向传播。

二

利玛窦开启的是一次范围广泛的学术交流,但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早已出现且从未间断,只不过早期交流的范围、目的、方式、结果等有所不同。由于早期的东西文化交流留存下来的多为实物而非文字记录,因而对于交流的历史需用考古学方法来加以考察。

考古发掘曾发现了许多史前及青铜时代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遗物,除了用传统考古学的方法对这些遗物加以比较分析外,近年来科技考古也为此带来了许多新成果。比如,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羊可能在距今1万年前于伊朗西南部地区被最早驯化,而马则可能在距今5000年前于中亚被驯化,中国的绵羊、山羊和马都不是本土起源而可能

来自西方。植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大约在距今4500~4000年前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取代粟和黍而成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冶金考古学的研究则表明冶铜业是从中亚向中国的中原地区传播的。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经检测就有一半含砷。砷铜最早出现在近东地区,在我国西北地区也有很多发现。陶寺出土的铜器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与西方的渊源。当然,来自西方的影响可能不止如此,中原地区的冶铁技术、马车制作,乃至一些青铜器形等,似乎也可以向西方寻找源头。

历史时期的东西方交流还留下了大量直接来自西方的物品,比如中国境内出土的来自波斯、东罗马、阿拉伯的金银币、玻璃器、金银器、釉陶器、饰品、织锦,以及一些模仿西方的工艺技术和装饰题材。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一些墓葬,如近年来出土的粟特人墓等,也因含有鲜明的西方文化因素而生动地体现出东西方的交流。与此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铜器等物品也传至西方。

考古学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可以发现那些文化交流留存下来的物品,确定它们的年代、来源、流传的途径与地域。由物可以了解文化交流的时代、内容、方式、路线,以及外来文化因素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深远影响,并进而探寻外来文化如何与本土文化交融而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文明。尽管考古学研究有如此重要性,但却似乎难以说明文化交流的更为具体的过程、方式、程度,一种文化对待另一种文化的态度,以及当时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等。对于此类问题,在缺乏文字记录的情况下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难以得出直接、明确的认识。

史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是通过人群迁徙来进行的,过程漫长。历史时期的交流除人群的迁徙和民族的融合外,还有很多交流是伴随着商贸活动而展开的。所有这些都与利玛窦以及耶稣会所进行的有目的、有组织的文化传播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各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差不多都反映出了一个共同点,即大多数时候,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似乎更多地限于技术层面而非其他。冶金术的发明,动物、植物的驯化,或者马车的制造,都属于技术的范畴。对这些技术的学习、革新、运用和推

广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西来的货币或其他物品也都只是物而不是思想、意识。至于那些葬俗相异的墓葬,死者或是西方人,或是与西方文化存在某种联系,这些都不足以代表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的接受。从利玛窦的经历可以看到,从万历皇帝到不同层次的地方官员,他们似乎对利玛窦带来的西洋自鸣钟、水晶三棱柱等奇异物品更感兴趣,万历皇帝甚至让最好的中国工匠彻夜向利玛窦学习钟表的使用和保养技术,而利玛窦也因此被安排在紫禁城的钦天监住了几天。《几何原本》虽然在18世纪70年代被收入《四库全书》,但几何学教育并没有被列入常规教育体系之中,而利玛窦传播的数学知识也只不过用于制造农具。利玛窦曾向人们展示的那些欧洲书籍所引起的似乎只是人们对其精美印刷的惊叹,大家相信书信印得如此漂亮,内容一定不错。利玛窦所介绍的西方文学和艺术似乎未产生更多影响,更不用说天主教思想了。

除为实用目的而积极接受外来技术外,中国古代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还取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明朝初年曾有郑和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但明末社会已相当封闭。利玛窦为了进入北京历经周折,159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被拒,只因为当时日本入侵朝鲜半岛而使万历皇帝对外国人心生戒备。透过利玛窦的眼,我们明显感觉到了明代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欠缺。利玛窦观察到,中国绘画不懂得使用油彩和表现物体的阴影,中国的音乐表现没有低音、高音、抒情等音律变化,音色达不到和谐,尽管如此,人们依旧自得其乐并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音乐存在。1595年,利玛窦在南昌为回应“建安王”对欧洲人关于友谊的看法用中文写就《交友论》,文章一经出版即受到知识界的热烈追捧,其原因不外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仍然视自己以外的人为“蛮夷”,他们没想到,欧洲人能够在友谊的话题上做出如此高雅的论述^①。在见到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之前,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地图”只是一幅李之藻在年轻时所绘制的包含了15个省份在内的中国地图而已^②。明朝对外部世界的有限了解和对外来者的排斥,与同时期的西方对外部世界的极大兴趣、热情,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探险与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利玛窦同样发现,即使在明代僵化的科举制度和宋明理学的重压之下,中国社会仍然不乏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深刻洞察力的思想解放之士,正是这些人给予利玛窦以希

望和信心,或许也给予了中国希望。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曾经吸引了不少官员学者的浓厚兴趣,唤醒了像徐光启、李之藻等思想敏锐之士对西方科学的强烈渴望。值得玩味的是,即便是像李之藻这样的因一张地图而改变对世界的看法的人物,他仍然像当时的文人学士一样,请人将诗词题写在地图上,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把代表着向外部世界的探索的地图当成了一件艺术作品。

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文化交流的看法也有所差异。2010年3月,首都博物馆在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马尔凯大区的协助下在北京推出了题为“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的展览,用丰富的图片及实物资料向观众展示了16、17世纪欧洲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面貌,并以剪影的方式勾勒出了利玛窦在明代中国的生活侧面。人们能够抛开对利玛窦作为传教士所可能有的戒备和偏见而把他当成一个西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者加以缅怀,这样的展览不可能出现在100年前的中国。同样,对于早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过去考古学关注不多,并很少谈及西方的文化因素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但在今天,文化交流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学界不仅关注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还关注东方和西方的交流。对于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和某些家养动物及农作物等,人们也开始从西方探索它们的起源。应该说,只有一个成熟自信的民族才能对其他文化持有更为开放的心态。

值得关注的是,在大洋彼岸,差不多与首都博物馆的展览同时,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在展出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与同时期的西洋古代地图相同,利玛窦的这张地图的下方写有古典作家西塞罗的话: QUID EI POTEST VIDERI MAGNUM IN REBUS HUMANIS, CUI AETERNITAS OMNIS, TOTIVSQVE MUNDI NOTA SIT MAGNITUDO, 其中文意思是说:“当人们理解了永恒和整个世界的广袤之时,谁还会视人类事物为伟大?”^⑪利玛窦熟悉并喜爱西塞罗,他正是在对永恒和无限的无尽追求的信念支撑之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今天展示一张17世纪的地图当然不全是为了纪念利玛窦,而是想向世人展示,过去的中国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封闭,中国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向其他文化开放的,

这一点或许向西方人解释了中国在今天崛起的根源。利玛窦的地图再次为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 and 交流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注释:

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关于这张世界地图的产生始末参见《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15页;安国风(Peter M. Engelfriet)著,纪志刚、郑诚、郑方磊译:《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第75页,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4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即北京车公庄滕公栅栏外国传教士墓地,现在北京市委党校内。

关于耶稣会的成立背景及利玛窦所受的耶稣会教育情况可参安国风(Peter M. Engelfriet)著,纪志刚、郑诚、郑方磊译:《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第12~24页,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56、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赵志军:《小麦东传与欧亚草原地带》,《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何弩:《中原与北方文化互动决定中国文明核心形成于黄河中游地区》,《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⑪ 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3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⑫ 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⑬ 此处拉丁文的翻译参考了英语翻译。

(责任编辑:周广明)